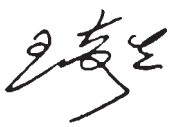
國民革命：一場兩國三方的複合型革命



二十世紀中國連續發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朝帝制；國民革命推翻了北洋政府；共產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三場革命中，國民革命承前啟後，繼承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業，又開啟了共產革命的新路。但國民革命的「歷史存在感」相對較弱。相對於前後兩場革命，學界對國民革命的研究明顯薄弱得多。直至今日，學界對這場革命的過程、性質、結局、意義及影響等，仍有不同的描述和評判，甚至對這場革命也有不同的稱謂。之所以如此，主要緣於這場革命本身的複雜性。概言之，國民革命是兩國三方（國、共、蘇）共同進行的一場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國際革命與國內革命於一體的複合型革命。參加革命的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與互不相同的革命目標，三方之間的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形態與前後不同的變化，三方內部又有不同的人事派別、權力紛爭與路線分歧。革命最後以國勝、共敗和北洋政府滅亡收場，卻又成為另一場新革命的開端。在相關史料日趨豐富多元的當下，這場革命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一　國民黨：國民革命的勝利

1924至1927年，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老革命黨國民黨與成立僅三年的新革命黨共產黨攜手合作，共同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國民革命。因為兩黨有共同的革命目標，故而有合作的基礎；又因兩黨有各自的政治訴求，導致合作期間有分歧，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時期的國共關係，是一種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的關係。

中國國民黨由同盟會(1905-1912)、國民黨(1912-1914)、中華革命黨(1914-1919)演化而來，此前已進行過反清、反袁(世凱)革命。對國民黨而言，國民革命可以說是反清、反袁革命的延續。反清革命不僅推翻了清朝，還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就革命本身而言無疑是成功的。只是從孫中山革命黨的立場而言，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奪去，故要再起革命。二次革命雖然沒有直接推翻袁世凱，但隨後袁世凱稱帝失敗並死亡，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二次革命成功了一半。袁世凱死後，形成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局面。國民革命的目標是打倒軍閥、統一全國，完成之前革命的未竟之業。故從國民黨一方而言，無論革命目標、革命性質，還是革命力量，國民革命均是前兩次革命的歷史延續。相對於反清、反袁革命而言，國民革命有幾個顯著特點：一是建立了職業革命武裝；二是有穩定的革命根據地；三是有強大的國際外援；四是由一黨獨革變為兩黨共革。

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孫中山的革命觀念發生了變化。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贊成議會政治。但刺殺宋教仁案發生和袁世凱解散第一屆國會後，孫中山對議會政治徹底絕望。1914年建立中華革命黨，意味着他完全拋棄了依託議會開展和平政治競爭的路徑。孫中山重拾同盟會時期曾提出的訓政主張，告別民國初年多元主義的議會政黨政治，回歸一元主義的一黨訓政。他強調中華革命黨已不是議會政黨。《中華革命黨總章》第五條明文規定：「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①隨後又明確提出革命成功後，「非本黨不得干涉政權，不得有選舉權」②；「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③，意味着革命成功之後，由革命黨一黨壟斷政權，不僅要以黨建國，而且要以黨治國，實際否定了民初革命黨向議會政黨轉型以及議會政治的正當性。


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孫中山的革命觀念發生了變化。(資料圖片)

學界多認為孫中山的以黨治國主張乃1924年「以俄為師」的結果。其實，自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中山關於一黨治國的理論即已成型；1917年俄國革命的勝利，重新燃起了本來就持有「在革命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看法的孫中山對一黨制的強烈興趣④。孫中山與列寧的主張在某些方面早已暗合。俄國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對於列寧主義政黨及其政治軍事體制欽佩不已，進而學習其治黨與黨治經驗。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在「以俄為師」的背

景下，「黨治」理論正式確立。李劍農認為，國民黨的改組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此後政治中所爭的，將由「法」的問題變為「黨」的問題；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⑤。隨後黃埔軍校和廣州國民政府相繼成立，「黨軍」與「黨國」體制從理論付諸實際。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黨治」政權的建立。當國會制度在中國北方趨於消亡之際，恰是蘇俄黨治體制在中國南方開始試行之時。中國政治體制在十多年的時間裏，由「帝治」轉為「民治」，由「民治」轉為「軍治」，又由「軍治」轉為「黨治」。俄式黨治體制是國民革命留給中國政治的重要遺產。

一般的看法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革命也失敗了。說辛亥革命失敗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說國民革命失敗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對國民黨而言，通過國民革命，由一個封閉型精英政黨轉變為開放型群眾政黨；北伐戰爭由珠江流域迅速打到長江流域，最終推翻了北洋政府，結束了袁世凱以後軍閥混戰和割據的局面，確立了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國民黨無疑是國民革命的最大贏家。亦因為此，國民黨以1928年完成全國形式統一的東北易幟作為國民革命勝利結束的標誌。

至於「國民革命」的稱謂，孫中山早在1906年〈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即有提及：「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⑥此時孫中山所強調的是「革命主體」的轉換：革命主體由少數英雄豪傑轉向全體國民，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以自由平等的「國民」取代君主專制之下的「臣民」。不過，此時革命的重心在「排滿」的「民族革命」，對「國民革命」只是順帶提及罷了。

到1924年國民黨改組，孫中山重拾「國民革命」概念並賦予其新的含義。與辛亥革命時期相比，此次「國民革命」的主體已由「全體國民」轉向帶有一定階級取向的「一般平民」和「農夫、工人」，而以帝國主義與軍閥為革命的對象。國民黨一大宣言聲稱：「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⑦但在工農解放問題上，孫中山反對採取階級鬥爭方式，指出：「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⑧。他並強調「凡屬一切真正的革命份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為何，吾黨皆應集中而包括之」⑨。這充分顯示了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所具有的階級模糊性、包容性、寬泛性和非階級鬥爭色彩。其包容性與寬泛性成為國民黨「聯俄容共」的基礎，而其階級模糊性與非階級鬥爭色彩則成為之後國共走向分裂與對抗的要因。

二　中共：從「國民革命」到「大革命」

從中國共產黨來看，國民革命確實以失敗告終。不過，在中共黨史上，國民革命仍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典」革命話語，共產黨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中共成立時即宣布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為旗幟。但當蘇聯從其外交利益考量與國民黨建立同盟關係後，其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乃強迫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共產國際還為此建構出一套理論：一個國家非經過國民革命不能有社會革命；中國必須先經過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具體而言，中共先幫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擁護它奪取全國政權，然後在它的統治下準備自己的革命，進而推翻它而取得政權⑩。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將革命分兩步走，先參加國民革命，再進行社會革命。參加國民革命只是過渡性、階段性和策略性的舉措。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為適應國民革命而將革命目標調整為「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兩大口號中，「打倒軍閥」是隸屬於「打倒帝國主義」的。北伐之前，中共革命確實以「反帝」為重心，其突出表現是1925年的「五卅運動」。北伐開始後，中共革命的重心明顯轉向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其突出表現是兩湖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前期以民族鬥爭為主，後期以階級鬥爭為主。前期的民族鬥爭大體在國民革命的範疇，而後期的階級鬥爭顯然超越了國民革命而帶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據這場革命的親身參與者鄭超麟回憶，「我們那時口頭談的，筆下寫的，雖有許許多多『國民革命』字樣，但是禿頭無字的革命則是專指我們自己的革命的」⑪。意即以「國民革命」之名，行「社會革命」之實；視「國民革命」為國民黨的革命，視「社會革命」為共產黨的革命。這大體反映了那時中共黨人參與國民革命的真實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至1927年間，無論共產國際還是中共，對內對外均稱這場革命為「國民革命」。然而在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竟將這場革命稱作「大革命」並給予高度評價。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在由上海去漢口的輪船上碰到剛從俄國回來的潘家辰。潘家辰告訴他：「〔共產〕國際同志認為世界各國革命史上配得上稱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以及現在的中國革命。」⑫1928年7月，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共產國際六大上所作的〈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提綱中明確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帝革命鬥爭的一系列事件中，「最為重要、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就是中國的大革命。它吸引着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直接捲入革命的有幾千萬人，間接捲入的則有幾億人，他們第一次奮勇地投身到反帝鬥爭中去」⑬。共產國際的這一評價，迅速傳回中共黨內。1931年華崗撰寫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出版，該書直接將1925至1927年革命稱為「大革命」。1945年中共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1924至1927年革命為「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可見，「大革命」的提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⑭。從此，一個來自共產國際的評價性稱呼直接變成了這場革命的正式稱謂，而「國民革命」這一歷史稱謂反而被中共官方黨史編纂者棄用。

鄭超麟1945年撰寫回憶錄時，即對共產國際將「國民革命」與法國、俄國革命並稱為「大革命」表示懷疑。在他看來，國民革命不過是通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中間階段」。「將中間階段稱為『革命』已很勉強了，怎能稱為『大革命』?」何況革命還失敗了⑮。就革命的規模、烈度而言，中共後來的革命確有更「大」更激烈者，但這場革命在中共黨史上的奠基性意義不可低估。國民革命時期，中共迅速崛起。到1927年，在全世界四十多個共產黨中，中共的規模僅次於蘇聯共產黨。國共分裂前夕，中共已是一個擁有5.8萬黨員、3.7萬團員，還有290餘萬工會會員、900餘萬農會會員和15萬童子團成員的政治組織，其組織觸角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和各階層民眾⑯。從工人、農民、學生，到青年、少年、婦女，如此範圍廣泛、規模龐大的群眾在兩三年內被納入到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並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是國民革命區別於辛亥革命的重要特徵，而這一特徵主要緣自共產黨而非國民黨。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中央雖然設立了農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婦女部和商人部等群眾運動的領導機構，但國民黨人多不願從事下層群眾運動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團員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合作的形態，逐漸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國民黨重視軍事、共產黨重視群眾的分工格局⑰。

二十世紀的中共革命與政治治理，幾乎以群眾運動貫穿始終。無論是在革命奪權階段還是在執政以後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群眾運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學界對中共群眾運動的研究多注目於延安時期及之後，甚至將1949年以後的革命模式，歸之為「延安道路」的產物⑱。其實國民革命時期才是中共群眾運動的奠基期。這個時期的中共是一個沒有武力、沒有地盤，純粹以宣傳主義、組織黨團、動員群眾為中心任務的革命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眾運動的基本模式，積累了豐富的策略、經驗與技巧，也形成了一些難以克服並在此後數十年的群眾運動中反覆呈現的流弊與困擾。如中共的群眾運動，始終難以擺脫這樣一個「怪圈」：群眾運動初期，必須「放手」發動，才能運動起來；一旦運動達到高潮，就難免失控，以至每次群眾運動都會「過火」；也總是在「過火」之後，才能着手收束。這一現象早在北伐時期即已呈現。

「鬥爭性動員」機制是北伐時期中共開展群眾運動的一大創制。每次群眾運動，中共都要首先確定鬥爭對象，使群眾分化，爭取多數、打擊和孤立少數。一旦聲勢壓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須站隊，而不得猶疑徘徊於兩者之間。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中的「鬥爭性動員」機制做過很好的描述：由於

將少數地主階級打入「另冊」，不准其加入農會，因此使他們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原本觀望者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而那些加入農會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種相對的政治優越感⑲。對中共而言，對農民「冊封」這種政治優越身份，幾乎不需要甚麼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價，急速而有效地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這種政治動員模式，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群眾性政治運動中得到繼承和「發揚」。

相對於之後中共革命重心和主體轉向農村和農民，國民革命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更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典」性。以上海為中心的五卅運動和以廣州為中心的省港大罷工在規模和聲勢上達到了中共歷史上工人運動的鼎盛期。五卅運動期間，全國大約有600座城鎮、1,700萬人⑳、近萬個民眾團體直接參加了這場運動。各地為援助五卅運動而發生的罷工多達135次，罷工工人總計約五十萬㉑。而長達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在組織領導上比五卅運動更完備、更嚴密。之後中國的工人運動再也沒有過如此巨大的規模與聲勢。

就激進化程度而論，北伐時期兩湖的工人運動也是空前絕後。尤其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間的武漢，幾乎是「無工不組會，無會不罷工」㉒。1927年春，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更開創了工人運動軍事化的先河。以此觀之，這個時期的中共革命確實大大越出了「國民革命」的軌道。這種激進「越軌」為中共後續革命所繼承並擴大。

三　蘇聯：國民革命的幕後主導者

革命借助外力不足為奇。但像蘇聯及共產國際之深度介入國民革命，在此前世界革命史上仍極罕見。在「以俄為師」的旗幟下，無論組織人事、政治指導，還是軍事和經濟援助，蘇聯均是這場革命的幕後主導力量。

中國現代史以1919年為開端早已成學界共識，1919年又以五四學生運動的爆發為標誌。僅就學潮而論，狹義的「五四」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其實有限。相對而言，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的成立，對中國現代史，尤其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走向影響更大。直到今日，中國的執政黨仍在1919年3月2日的歷史延長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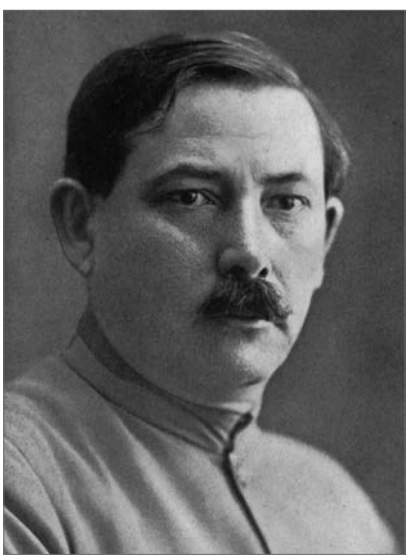
共產國際並非各國共產黨的聯盟組織，而是一個嚴格實行中央集權、鐵的紀律、行動統一的世界性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只是它的「支部」。與第二國際鬆散的聯合會式的組織形式不同，共產國際強調各國共產黨對它的絕對從屬關係。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毫不遲延、不折不扣、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有權撤銷或修改各國共產黨中央機構和代表大會的決定，有權罷免經各國共產黨黨員選舉產生的黨魁，而代之以由它選定的黨魁㉓。

共產國際的這種組織體制，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可謂利弊參半。一方面，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在經濟上得到蘇聯的援助，才得以迅速崛起；中共早期反覆強調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並以自己的黨作為「國際政黨」的支部而自豪，自我感覺比以國民革命為目標的國民黨要高出一籌。另一方面，因一切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中共的獨立自主空間極小；當蘇聯及共產國際的利益與中國革命的利益相悖，當共產國際的主義方針政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脫節時，勢必使中國革命的利益受損，甚至導致革命失敗。

共產國際成立之初，即宣告其目的是要推翻國際資產階級，以世界共產主義制度來代替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共產國際要求各國革命的利益必須服從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但是，共產國際本身實際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領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財政上都處在其嚴密控制之下。蘇聯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絕對的優先權，蘇聯的國家利益高於各國革命的利益。故共產國際方針政策的出台，既有基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考量，更有基於蘇聯國家利益的盤算。

列寧最初將世界革命的重心放在歐洲，認為殖民地的解放只能與宗主國的工人階級的解放連結在一起才有可能。在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等級體制中，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處在階梯的最低一級。在列寧看來，如果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人階級在數量上、經濟上和思想上都極為薄弱的話，它在一個長時期內都不能在民族解放運動中起主導作用。中國自不例外。

另一方面，蘇聯在列強的包圍和孤立的形勢下，迫切希望與之相鄰的中國建立一個對其友好和親近的政權。在莫斯科看來，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未來中國最有希望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預判未來中國的天下會是國民黨的天下。基於其國家利益考量，希望使國民黨親俄、友俄，以解除蘇聯在東方的後顧之憂，故而決定同國民黨結成聯盟，並全力支持國民黨。在中共力量與中國工人隊伍均十分弱小的情況下，莫斯科主張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將希望主要寄託在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身上。莫斯科強制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與國民黨一道從事國民革命，即是基於這樣的考量。


孫中山在世時，對鮑羅廷予以高度信任和倚重。(資料圖片)

蘇聯在經濟上、軍事上給予國民黨極大的援助和支持，為國民黨建黨、建軍以及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據不完全統計，在國民革命期間，蘇聯和共產國際分別向國民黨和中共提供了約1,400萬盧布和26萬盧布的經濟援助㉔。對國共經濟援助之如此區別對待，反映這個時期蘇聯對華政策的重心在國不在共。當中共黨

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又被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為代表的蘇聯所控制後，莫斯科方面信心滿滿，以為國民革命的前途與命運全在其掌控中。孫中山在世時，對鮑羅廷予以高度信任和倚重，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一度有國民黨「太上皇」之勢，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高等顧問」，直接參與國民黨中央的最高決策。張國燾描述當時鮑羅廷的特殊地位說：「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㉕

鮑羅廷直接受斯大林指導。由於他能「通天」，從而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駐華的主要政治代表。蘇聯對國民黨的相關指導、聯絡與物質援助（軍火、金錢等），均由他主持。蘇聯派遣到國民黨及其政府和軍隊中工作的所有政治和軍事顧問，都要受他節制。在國民黨方面，他以顧問的身份，運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孫中山逝世後的廣州幾乎肩負着實際領導責任。至少在1924至1926年三年間，鮑羅廷代表莫斯科對國民黨及其國民革命發揮了主導性作用。

四　國共兩黨：從合作到分道揚鑣

1924至1927年間國共組織關係的複雜情形，遠非過去人們認知中的國民黨「容共」或「聯共」所能簡單概括。初期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期轉變為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中共意識形態的強勢宣導、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和民眾運動的日趨「包辦」，以及中共組織嚴密與國民黨組織渙散的強烈反差，使中共逐漸「反客為主」。初期國民黨「容共」，後期轉化為共產黨「容國」。鄭超麟回顧這段歷史時，甚至認為1927年中共「幾乎奪得了政權」㉖。

共產黨得到蘇聯主義和組織上的指導，國民黨得到蘇聯軍事和經濟上的援助。共產黨有主義有信仰，擅長組織，擅長宣傳，擅長群眾運動，但沒有根據地和職業革命武裝；國民黨的主義信仰、組織宣傳和群眾運動均遠不如共產黨，但有地盤，有軍隊。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鬥，一個擅長文鬥。兩黨關係融洽時，互補共贏；兩黨目標和利益發生衝突時，擅長組織宣傳的共產黨最終敵不過有槍桿子的國民黨。

莫斯科之所以沒有幫助中共建立自己的軍隊，主要緣於其俄國革命的經驗。蘇聯紅軍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才建立的。莫斯科為何幫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此乃孫中山強烈要求的結果。孫中山以自己革命的教訓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

這個時期，國民黨的主體既非「資產階級」，共產黨的主體亦非「無產階級」。兩黨的黨員構成和社會基礎，其實並無多大差異。兩黨的骨幹活躍份子大多是五四和後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知識青年。自1905年廢科舉興學堂，歷經十多年新式教育的「批量生產」，到五四前後，中國都市社會累積了一大群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此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水平尚無法提供相應的職位和就業機會來吸納與安置他們。他們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對外來主義抱有濃厚興趣，遂成為國共兩黨競相吸納的政治資源和有生力量。

1924至1927年間，南北軍政格局發生了快速激烈的變化。南北政權實際在朝着相反方向發展：南方革命力量在國共兩黨主導下迅速發展壯大，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和爭鬥日趨激烈。因北京中央政府被軍閥勢力挾持，當南方革命黨誓師「北伐」時，北方軍閥則以中央政府名義宣布「南征」。其時號稱中立的報刊將這場軍事衝突稱為「南北戰爭」。當時輿論對這場戰爭的最大關注，是被稱作「黨軍」的新型軍隊的出現，認為中國軍隊歷來無主義，而「黨軍」的最大特色就在有主義。北南相爭，是「無主義者與有主義者抗」㉗。輿論認為，「運用主義」是北伐軍致勝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時間，「主義」成為時髦；與之相隨，宣傳也成時尚。中國從此進入「主義時代」和「宣傳時代」。

國共兩黨協作進行的北伐戰爭一舉戰勝北洋軍閥，結束了袁世凱以後軍閥混戰和割據的局面。但兩大政黨亦以此為契機分道揚鑣，轉向一場更為持久的軍事和政治較量。國民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共產黨則將國民黨定為新的革命對象，並從城市暴動型革命轉向農村根據地型革命。這樣的轉折，意味着走上一條漫長的革命之路。從武昌起義的兩月多，到北伐戰爭的兩年多，再到國共內戰斷續二十餘年，革命的時間成本愈來愈大；革命的烈度更如高山滾石，愈滾愈急，愈滾愈猛。

1927年國共分裂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極為殘酷。據1928年6月周恩來在中共六大所作的〈組織報告〉中的估算，一年多來，被殺的有三十一萬到三十四萬人左右㉘。六大另有兩個統計，一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下黨之犧牲的數目」，總計26,454人；一是「中國白色恐怖中死亡及在獄人數統計」，自1927年3月至1928年2月止，總計被殺人數337,568人㉙。按理說，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情境下，不大可能有如此精確的統計。姑以兩個統計數據比較，被殺者中，中共黨員僅佔7.8%。那麼另外90%多是甚麼人？筆者推斷，主要是兩部分人：一是國民黨左派知識青年；二是參加革命的工農群眾。這場白色恐怖，共產黨固然遭受重大打擊，國民黨自身也損失慘重。「清黨」前，國民黨黨員總數在100萬以上；「清黨」後，據1929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總數為65萬，減少約35萬㉚。

1960年斯諾（Edgar Snow）訪問中國時，毛澤東跟他說：1927年蔣介石開始反共時，共產黨員原有約5萬人，「大屠殺」後只剩下約1萬人。到1960年，這1萬人陸續死得只剩下大約800人。歸根結底，中國是靠這800人管了多年，

而且還要管好多年㉛。確如所言，從建黨的陳獨秀，到建國的毛澤東，再到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中共的核心領導層與骨幹力量始終是國民革命的一代。國民革命不過三年，其影響則長達數十年。

從後見之明看，幼年期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如同「借殼上市」，借國民黨的旗幟和地盤，在國民革命的名義下，兼顧自己的社會革命，在兩三年的時間裏迅速發展壯大，把千百萬工人、農民捲入革命洪流，為後續革命鋪墊了群眾基礎，培養和鍛煉了大批黨的幹部，初步探索和構建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在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方面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武裝鬥爭方面吸取了深刻教訓，在組織、宣傳和群眾運動方面為後續革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長遠看，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場，國民革命也未必「失敗」了。

註釋

① 《中華革命黨總章》（1914年7月8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97。

② 孫中山：〈批伍曜南函〉（1914年7月23日），載《孫中山全集》，第三卷，頁104。

③ 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説〉（1920年5月16日），載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62-63。

④⑤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1），頁544；531。

⑥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間），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96。

⑦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1月23日），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86-88。

⑧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1924年8月），收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69、392。

⑨ 〈關於容納共產黨員問題之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1924年8月21日），載孟慶鵬編：《孫中山文集》，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頁411。

⑩⑪⑫⑮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1919-1931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87-88、125-26；131；164-65；165。

⑬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572。

⑭ 參見李蓉：〈「大革命」稱謂與共產國際〉，《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11期，頁46-47。

⑯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0-12；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67。

⑰ 1927年2月24日，顧孟餘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會上感慨說：「現在可有一種危險，是國民黨差不多專做上層的工作，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多。至於下層的民眾運動，國民黨員參加的少，共產黨員參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種畸形的發展，很像國民黨是在朝黨，共產黨是在野黨的樣子。」參見顧孟餘：〈武漢二屆三中全會提案大綱之說明〉，載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頁111。

⑱ 賽爾登對西方學界自二十世紀40至90年代有關中共革命的研究，做過一個很好的學術總結。參見賽爾登（Mark Selden）：〈後記〉，載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268-69。

⑲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5-16。

⑳ 任建樹、張銓：《五卅運動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240。

㉑ 曾成貴：《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135。

㉒ 〈漢口工會運動之寫真〉，《大公報》（天津），1926年12月1日，第2版。

㉓ 烏索夫（Viktor Usov）：〈序言〉，載烏索夫著，賴銘傳譯：《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頁5；〈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1924年7月），載德格拉斯（Jane Degras）選編，北京編譯社譯：《共產國際文件》，第二卷（1923-192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頁164-71；布勞恩塔爾（Julius Braunthal）著，楊壽國等譯：《國際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頁202。

㉔ 朱洪：〈大革命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國共兩黨經濟援助之比較〉，《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頁52-57。

㉕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57。

㉖ 鄭超麟：〈自序〉，載《鄭超麟回憶錄，1919-1931年》，頁1。

㉗ 政之：〈主義與飯碗〉，《國聞週報》，第3卷第39期（1926年10月10日），頁1。

㉘ 周恩來稱，白色恐怖可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是由陳贊賢被殺到東南遍地的大屠殺。在這時期大概死了十二萬以上。第二是從夏斗寅叛變到馬日事變，以及武漢政府叛變、馮玉祥叛變和其他各地大小的屠殺，統計被屠殺的約十七萬以上。第三是由廣州暴動到現在，這是最後的一幕。全國民眾運動取消的當中，被屠殺的約在五萬以上。總括的計算，被殺的有31萬到32萬〔的〕左右。」筆者將三個時期的數字相加，是三十四萬人以上。參見周恩來：〈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著：《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頁401。

㉙ 〈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材料〉（1928年7月），載《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上冊，「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下黨之犧牲的數目」、「中國白色恐怖中死亡及在獄人數統計」，頁215-16。

㉚ 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294。

㉛ 斯諾（Edgar Snow）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1936-194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附錄二，〈人物小傳（二）〉（1968），頁166。

王奇生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